



福建教育学院梦山丛书

闽台

交融的考试纽带

清代福建乡试研究

刘一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福建教育学院梦山丛

闽台

交融的考试纽带：

清代福建乡试研究

刘一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清代福建乡试研究/刘一彬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10

(福建教育学院梦山丛书)

ISBN 978-7-5615-5293-3

I. ①闽… II. ①刘… III. ①乡试-研究-福建省-清代 IV. ①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3412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韩轲轲

封面设计 张 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41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刘海峰

在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乡试和会试是各层级科举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考试，或者说是科举考试的核心层级。《钦定科场条例》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谈乡、会两级考试。我们现在说的科举通常包括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层级，若将考翰林院的将朝考算在内，则有五级，不过清人所说的科举往往是指乡会两级考试。

乡试是明清时期科举系统中影响面最大的一级考试，当时所说的“科举”最经常是指乡试，特指的“科举”便是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乡试虽然分省考试，但统一时间，统一步调，统一考试大纲（尽管考题不一），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为了在同一时间开考，边远省份的主考官往往须提前两个月从京城动身前往该省贡院。大比之年的八月前后，各个举行乡试的省会城市都以乡试为中心话题。以乡试为代表的科举制对各地教育、民风、习俗乃至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是一种高竞争、高收益、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其难度之大，甚至有“天下事之至难者，莫如中式矣”（石成金《传家宝·中式金针》）的说法，而真正难度最大的还是在乡试。清代乡试竞争越来越激烈，到后来不少省份一些科次的录取率是1%左右，中举的概率异常之小。我在《台湾举人在福建乡试中的表现》一文中提出，根据康熙乾隆年间的《福建乡试录》，在可以考出录取率的4科乡试中，录取率都只有1%强，竞争激烈可以说到了残酷的程度。以康熙到光绪朝的部分《福建武闱乡试录》为依据，清代福建武乡试多数科年的中举率为3%左右，比文闱宽松许多，但也相当不容易。

科第中额不仅往往是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方面，而且也与某一地区教育水平和文风高下密切相关，所以科名既是个人和家族

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地方集团或区域群体的追求对象。一般地方长官往往会为本地争取更多的科第中额。

乡试是让全省各地考生通过同一标准进行考试竞争,因此中举人数的多寡便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文风高下和教育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最客观的评价指标。但是,完全按考试水平录取,造成了科名的高度聚集现象,省会的举子往往考中的比例较高,而边远地区的举子中式比例较低。科举考试具有提升文化教育水准、维护朝廷向心力、促进社会阶层和区域流动的功能。为了扶植边远省区人文教育,照顾边远地区的举子,明清两代都实行过优待边疆地区的政策,或者是增加边疆省份的乡试名额,或者是对某一特定边远地区的举子实行优惠政策。对台湾府县的举子另编字号实行定额录取,便是清代科举实行保障名额的典型之一。而在会试中对台湾举人专列名额录取在全国各地中是独一无二的。

清代闽台科举考试在制度方面完全一致,录取则一体统筹,在此基础上于福建乡试录取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立了保障名额。同时,给予赴福州参加乡试的台湾士子以“官送”的待遇。设立保障名额的优待办法使台湾士子欢欣鼓舞,更加热衷于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增加了台湾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有利于闽台文化的交融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另一方面,科举诱使清初许多闽南人赴台冒籍应试,虽挤占了部分台湾士子的生员和举人名额,但客观上却加速了汉移民的土著化,促进台湾的文化和社会开发,也促进了台湾的儒文化、中土化,强化了中央、省城和边陲的关系。

三年一度的乡试是全省士子的大聚会。各外地府县举子经过艰难跋涉,提前来到省城福州,直到参加乡试,许多人还等待发榜,前后在省会居住一两个月。这为各地举子交流观摩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是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场域。台湾举子渡海来榕城应举,留下了许多诗文,也反映出乡试对闽台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清代福建乡试中的台湾因素逐渐增强,一直到台湾建省后还是如此。科名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日本占据台湾后,福建乡试中的台湾因素还没有完全消失,不仅有一些士人冒险来大陆参加乡、会试,而且福建乡试还继续引起台湾舆论的关注。闽台科举考试的渊源并未中断,依然延续下来,长达十余年,直至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这

种联系才告结束。可以说,科举是清代闽台交流的重要纽带,是融合两地文化教育的关键制度。在清代各省乡试中,福建乡试有其特殊性,其中闽台关系中的科举纽带是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很值得专门研究。

刘一彬考入厦大跟随我攻读教育史专业“科举学研究”方向博士学位以后,我就指导其以“清代福建乡试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用“闽台交融的考试纽带”为正标题,以突出清代福建乡试的最大特色。一彬博士在全面研究福建乡试的基础上,十分注意探讨清代福建乡试的独特性。除研究闽台的科举联系以外,还针对福建客家与畲族两个参加乡试的特殊群体,考察其在清代福建乡试中在没有特殊优惠政策之下的中举成效;研究清代福建乡试与福建刻书业的互动关系;最后对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思,指出清代福建乡试选拔出李光地、林则徐、梁上国、梁章钜、陈宝琛、王仁堪、沈葆楨、林绍年、苏廷玉、廖鸿荃等人,后来成为清代朝廷的中流砥柱,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文化名人,也选拔出陈寿祺、陈衍、林纾等文化教育名家,并选拔出丘逢甲、林旭等爱国志士。作者认为,清代福建乡试可以说是当时福建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整体结构中的核心部分。论文中许多观点,颇有价值。如今,其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充实修改,即将付梓,问序于我,作为导师理当不辞,爰书数语,以识卷端。

2016年3月7日

摘要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层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影响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它既是国家抡才大典,也是各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中的大事;它既牵涉到广大应试士子一生的命运,同时也会牵涉到众多与考试相关官员的前途。乡试与区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特别是清代福建乡试具有独特性。鉴于乡试本身的重要性和清代福建乡试的独特性等方面考虑,本书选取清代福建乡试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福建乡试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传承和延续乡试的合理内核,推进科举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国家大规模考试所具有的选拔人才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对福建教育史和文化史研究作一些有益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福建高考改革提供某种历史参照。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以制度史与活动史的角度从清代福建乡试的程式、中额和贡院等方面入手总体上把握清代福建乡试的基本概况;其次,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结合时间和空间两个空间维度对清代福建乡试中式举人在各府州县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以揭示其分布变化的规律,并针对福建客家与畬族两个参加乡试的特殊群体,考察其在清代福建乡试中在没有特殊优惠政策之下的中举成效;再次,通过把清代福建乡试作为一个闽台交融的纽带,研究清代政府对台湾士子的中举保障机制及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历史影响;其四是研究清代福建乡试与福建刻书业的互动关系;最后,对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思。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为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

本书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的背景、意义、文献综述、思路、方法与结构进行阐述。第一章清代福建乡试概述,这一部分对清代福建乡试程式、福建乡试中额、福建贡院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勾勒出清代福建乡试的大致图景。第二章清代福建举人的地理分布,通过统计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结合定性的分析从宏观性的地域上及时间序列上分析清代福建解元和举人的地理分布特点,并对清代福建涌现出的科举家族进行微观上的分析。第三章清代福

建客家与畬族子弟乡试中举成效,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清代汀州府客家子弟和台湾客家子弟的中举成效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对福建最大的少数民族畬族在清代福建乡试中没有中举保障名额优惠政策的情况下的中举成效进行剖析。第四章清代福建乡试中的闽台关系,以清代福建乡试作为视角研究闽台关系,内容包括台湾士子的中举人数、对台应试中举名额保障制度、应考乡试的艰辛历程、安全及善后保障制度、福建科第人物对台湾社会的贡献以及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历史影响等。第五章清代福建乡试与刻书业关系,首先总体上对福建刻书业与科举的升沉变易关系进行探讨,接着重点对清代福建乡试与刻书业的关系进行阐述,分别从福州刻书业、福州四大书院刻书、闽东南、闽西北刻书业等方面与乡试的关系进行详细探讨,最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清代福建各府刻书情况与举人数的关系。第六章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反思,首先简略地总体介绍科举考试的功能与作用,然后对传教士眼中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最后对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思。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一是清代福建乡试实实在在地影响着闽台两地广大士子的一生,其共同的考试烙印深深地嵌入在每一个应考士子的生命之中;二是清代福建贡院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朝的重修与展拓,规模和设施逐步完善起来,其修建历程反映出全省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三是整个清代福建举人的地理分布不论是解元还是整个举人群体均呈现出一种时空性的聚结现象;四是福建汀州客家子弟在清代福建乡试中取得较好的中举成效;五是清代福建乡试中涌现出不少的台湾粤籍客家举人,粤籍客家举人主要集中在清代的后半期,并以道光 and 光绪朝为最多;六是畬族在福建乡试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没有对少数民族实行中举保障名额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中举成效;七是清代福建乡试针对台湾士子设立的应试保障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文风繁盛和社会进步,增强了台湾士子对科举考试的向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八是科举与刻书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密切,清代福建乡试与刻书业的关系尤为突显,二者相互促进;九是清代福建乡试除了起到社会秩序的安全阀与调节器作用之外,还发挥着教育功能、文化选择功能和文化整合功能。

绪 论..... 1

第一章 清代福建乡试概述	12
第一节 清代福建乡试程序	12
第二节 清代福建乡试中额	44
第三节 清代福建贡院	56
本章小结	67

第二章 清代福建举人的地理分布及福建乡试中的科举家族	70
第一节 清代福建举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成因	70
第二节 清代台湾举人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成因	97
第三节 清代福建乡试中的科举家族及其对举人地理分布的影响	114
本章小结	127

第三章 清代闽台客家与畬族子弟乡试中举成效及其原因	129
第一节 清代汀州客家子弟乡试中举成效及其原因	129
第二节 清代台湾客家子弟乡试中举成效及其原因	143
第三节 清代福建畬族子弟乡试中举成效及其原因	151
本章小结	164

第四章 清代福建乡试中的闽台关系·····	166
第一节 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中举名额保障·····	167
第二节 台湾士子应乡试的艰辛历程及安全、善后保障制度 ·····	176
第三节 清代福建科第人物对台湾社会的贡献·····	184
第四节 清代福建乡试对台湾士子的历史影响·····	199

本章小结.....	214
第五章 清代福建乡试与福建刻书业的关系.....	216
第一节 福建刻书业与福建科举升沉变易关系.....	216
第二节 清代福建乡试与刻书业的关系.....	226
本章小结.....	246
第六章 清代福建乡试的功能与作用.....	247
结 语.....	261
附 录.....	265
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31

绪 论

科举已成为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质、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由于科举制地位重要且影响巨大,因此海内外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科举制,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由此便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科举学。可以预见的是,科举学必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乃至东亚学术界的一门显学。^①

科举是一种相对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因其不论血缘、地位与财富,按成绩择优录用,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基本制度。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学生涯中,科举是一种重要的经历,科场成为人文活动的首要场域。科举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复杂,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反映出科举时代政治、教育、文学、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光色。^② 唐宋以后,科举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是贯穿帝制社会后期的一根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科举制不仅对中国隋唐至明清 1300 年间的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研究的缘起

自从科举废除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普遍把科举制视为妖魔化的封建产物,对其压倒性的批判使多数人无视它在公正选拔人才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将其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各种罪责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因此,被“废科举,兴

^①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449 页。

^② 刘海峰:《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 6 期,第 19-26 页。

学堂”遮蔽了百年之久的科举正面价值无法彰显出来。科举废除后,军阀、各种政治运动、当兵、推荐等机制代替了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机制,所以出现人才的严重匮乏。对于科举,整个社会一直缺乏一种宽大、公正的眼光来审视它。对于批评或评价科举,面对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时代,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不过是一种“愤怒”,以否定为能事,进而由“愤怒”到流于尖酸刻薄的不在少数,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对科举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不相信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具有公平、公正的常道。^① 科举制的停废,成为中国古代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分水岭,它一方面使西方的教育理念和现代科学长驱直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经典和核心价值体系被全面瓦解,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② 时至今日,其是非功过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自从科举学成为一门专学之后,科举学研究经历了从宏观不断向中观和微观层面发展的态势,乡试作为科举考试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文中应有之义。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层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影响最大、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③ 乡试的本意是地方一级的举送考试。唐代各地举子要获得参加中央省试的资格通常需经过县、府(州)两级地方的考试。府州一级的选拔考试称为“解试”,意为解送举人入京的考试。从宋代以后,解试合格的举人尤其是曾多次被举送参加省试的举人,逐渐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可以补充担任地方的摄官或为参加解试的其他举子担保甚至免服丁役等。^④ 金朝科举分为乡试、府试、会试和御试四级,乡试其实是县试,正如洪皓在《松漠纪闻续》所说:“金人科举,先于诸州分县赴试,号乡试。”^⑤ 由此,乡试之名始于金朝,而明清两代省一级的乡试真正始于元代。元代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御试三级,由于元代开始设立省一级的行政区划,乡试虽是地方性的选拔考试,但属于省一级的考试。明清时期所说的“科举”最经常是指乡试,特指的“科举”便是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乡试虽然分省考试,但统一时间,统一步调,统一考试大纲,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考试。为了在同一时间开

① 刘一彬:《游走于科举与高考之间:一种超越的科举整体观》,《教育与考试》,2009年第6期,第38-43页。

②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③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21-26、41页。

④ 李弘祺:《宋代的举人》,《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第297-313页。

⑤ 洪皓:《松漠纪闻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考,边远省份的主考官往往须提前两个月从京城动身前往该省贡院。大比之年的八月前后,各个举行乡试的省会城市都以乡试为中心话题。所以,以乡试为代表的科举制对各地教育、民风、习俗乃至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科举大体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其中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乡试又称为乡闈,在南、北直隶(南京和北京)及各省省会贡院举行,每三年一次,通常在子、卯、午、酉年,考试的时间是在农历八月初九、十二和十五日三天,故又称为秋闈、秋试、秋榜、桂榜,也叫“大比”。乡试是科举系统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明代乡试通常的竞争比例是三十比一,即一个举人名额允许三十名考生入场。而清代中期以后则竞争更为激烈,录取比例从五十比一到八十比一不等,甚至有过一百比一的录取率。^①乡试的竞争激烈到几近残酷的地步,以至于不少人挖空心思企图靠作弊取胜,从清代发生的科场案来看,多数发生在乡试层次。获得了举人科名便意味着成为地方绅士,在社会上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因此有一些举人终身没有再去参加更高层次的会试和殿试,与现代有不少人获得硕士学位后不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点类似。清代还在皇帝登基、大寿等喜庆的年份特别举行乡试,称为乡试恩科。乡试是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凡是本省各府州县的生员、监生、贡生等,经科试合格都可以参加考试,考试中选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从明初开始,除了继续参加会试以外,举人也有入仕的资格,已成为具有特定身份地位的一种出身。明清时期举人在社会上地位相当高,获得举人科名是令人羡慕的快事。为了实现中举的梦想,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上演过一出人生悲喜剧。乡试对广大与考的秀才个人是一件大事,对地方来说则是各省人文活动的重大事件,对明清两代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科举是隋唐以后历代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乡试则是明清五百余年各省最令人关注的活动之一。乡试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明显的变化。

福建的开发和文明进程比中原地区晚,其文化教育的兴起与科举考试的兴盛基本同步,相伴相生,关系十分密切。在一定意义上说,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唐代以前闽中一带历来被视为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区域之一。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长安和洛阳一带,远离福建。直到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长溪(今福安)人薛令之考中进士,成为福建科举的开

①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七《礼部·贡举·录送乡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据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闽进士。中唐以后,经过李椅、常袞等人的几次兴学活动,参加科举者明显增加,林藻与欧阳詹等人的相继登第,从被视为“闽人未知学”逐渐变成“岁贡士与内州等”。^① 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使闽中人文水平日渐升高,为后来福建变成全国科举的重要省份,为宋代以后文化教育繁盛局面的出现开辟了道路。^② 宋代福建科第特别兴盛,《宋史·地理志》将“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作为福建的重要特点。宋代进士总数有四万名左右,福建进士人数有七千人左右,为全国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两宋一百一十八名状元中,福建人占二十名,为全国之冠。因此,宋代有“龙门一半在闽川”的说法。^③ 元代科举由于中断时间长且有民族歧视政策,因此,元代福建考中进士者并不多,至今有姓名可考的进士不足四十人。到明代高度重视科举取士之后,福建再次显示出雄厚的实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强省。福建的进士绝对数位居全国各省第四,但按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福建名列全国第一。在举人定额方面,福建排在第一层次,与江西、浙江、湖广并列为四大省。明代福建举行乡试九十科,录取举人八千三百二十五名。^④ 另外,明代福建共出过十一名状元、十二名榜眼、十名探花、十二名会元和九名传胪。^⑤ 明代福建的进士登科人数众多,掇取魁科者亦多,使福建成为人文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

清代福建科举的地位在全国相对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科举大省的地位,乡试举额位于全国各省前列。清代福建乡试开科 106 次,取中举人 9852 名。由于战乱,福建有五次停开乡试。清代全国举行会试 112 次,取进士 26747 名,其中福建 1399 名,在全国各省排名第八,比明代福建进士数排名第四有所下降。但按每百万人口中的进士数,福建在全国的排名与河北并列第二,因为排名第一的是不可比的旗籍人士。可见,清代福建仍属于科举强省,文化发达水平在全国仍名列前茅。但清初受海禁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福建科名总体而言比明代较为衰弱,只出过状元三名,榜眼六名,探花一名,会元一名。^⑥

对于清代福建乡试这一论题,刘海峰教授已对其概况做了深入的研究。^⑦ 其中对于清代福建乡试举额的历史变化以及举额在全国的地位等做了大致介

① 《新唐书》卷一五〇《常袞传》。

② 刘海峰:《唐代福建的教育与科举活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5 期。

③ 《八闽通志》卷四十五《学校·兴化府》。

④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52 页。

⑤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152 页。

⑥ 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1 年第 2 期,第 112-116 页。

⑦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年。

绍,对于清代福建历科乡试的考官、解元做了统计分析,并得出了清代福建乡试历科解元、举人出现明显的地区性结聚现象以及解元数与举人数大体成正比等十分有意义的结论。同时,还对清代福建乡试举人的地理分布与明代作对比,并从教育、海禁与倭寇侵扰、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对明清福建举人地理分布产生变化的动因作了挖掘和剖析,也对清代台湾士子参加福建乡试的情况作了一定的论述。

黄新宪^①和汪毅夫^②分别从闽台教育和闽台文化的一体化角度对清代福建乡试中的闽台关系作了论述,尤其是黄新宪对台湾科第人物与福州的联系作了探讨。杨齐福也对台湾举人做了一定的研究,^③陈泗东对清代末科泉州的举人也作了一定的研究^④。

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于清代福建乡试这一问题的探讨显然是不够的。因此,要从总体把握清代福建乡试这一论题必须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其中包括福建乡试中额、乡试考风考纪、福建贡院、福建举人的地理分布、中举家族、闽西及台湾客家子弟与畬族子弟这些特殊群体的中举成效、福建刻书业与福建乡试之间的关系等等,以及更进一步反思清代福建乡试功能与作用。

此外,乡试与区域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明清两代各省都力图增加举人录取名额,而举人定额是根据各地人口多寡和文风高下分配的。乡试录取的举人虽有定额,但省内各府县之间并无举额分配制度,完全是自由竞争,这有如现代高考分省区定额划线录取,但省内地区间并未限定上线指标。这样,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便成为全省各府县秀才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智力的大竞赛,备受全省士人的瞩目。各朝代都出现了科名的地区性聚结现象,中举人数的多少极其不平衡,最初科举较为成功的地区在先辈的示范激励之下,愈发热衷于读书应举,而科名较少的地区缺少帮助提携,往往容易失去信心,出现中举人数分化的马太效应。^⑤乡试所取举人是可供作科举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丰富的对象,尤其是进行特定时期同一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科名分布比较时,进士的样本偏少,而明清举人的数量则相当大。^⑥各地方志对明清举人的记载相当详尽,现存科举录也以乡试录最多。而各地中举者或入仕为官,或居于乡间,对朝野

① 黄新宪:《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汪毅夫:《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③ 杨齐福:《清代台湾举人之概论》,《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④ 陈泗东:《幸园笔耕录》,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

⑤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⑥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清代福建乡试具有独特性。清代,台湾无论是隶属于福建省还是单独设省,其士子都必须到福州参加福建乡试,并且清政府为安抚孤悬海外的台湾士子,对福建乡试的中举名额特为台湾士子设立保障名额。因此闽台两地在福建乡试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清代福建乡试中的闽台关系是科举学研究特别是乡试研究的一个特别之处。福建乡试是研究清代闽台关系的一大组成部分。福建客家是福建汉族中独特而稳定的民系、族群,畬族则是福建最大的少数民族,在清代福建乡试中研究这两个特殊群体的中举成效,显得特别有意义。另外,清代的福建刻书业与福建乡试关系密切,也值得深入研究。

鉴于乡试本身的重要性和清代福建乡试的独特性等方面考虑,本书选取清代福建乡试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福建乡试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留给世人严谨的学风、清明的考风和积极向学的精神遗产,通过传承和延续乡试的合理的内核,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国家大规模考试所具有的选拔人才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对乡试的研究可以推进科举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其学术意义非常明显。梳理和分析清代福建乡试,对福建教育史和文化史研究作一些有益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福建高考改革提供某种历史参照,同时亦可为其公务员考试提供某种历史借鉴作用。

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科举研究,并经历了科举研究的奠基期、低谷期和兴盛期,尤其是1980年至今科举研究更是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①1992年刘海峰教授提出“科举学”之后,“科举学”的研究成果正在加速增长,这些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以下对清代乡试已有研究成果做一综述:

(一)与清代乡试相关的著作及论文

1. 与清代乡试相关的著作

关于清代乡试制度的研究十分丰富。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②,对清代乡试的定制、场规、考法、考官、闱官、中额、试卷磨勘、举人复试等清代乡试规制做了较为全面、专深的研究,且可靠性强。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③,对清代乡试考试日程、资格、考官、弥封、糊卷、誊录和录取等流程做

①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1页。

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

③ 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出简要介绍。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①对清代乡试搜落卷及乡试复试制度做了一定深度的考辨。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对于举人和清代乡试竞争状况做了论述,另一专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也有论述到清代乡试。刘海峰与李兵合著的《中国科举史》对于清代乡试规制也做了全面、具体的阐述。马镛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清代卷上)对于清代乡试的考生与考官、乡试的考场规制、乡试的考法与录取的阐述较为全面和具体。李兵的《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从书院的角度探讨科举发展以及乡试的施行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对于清代乡试的考生、考试内容、照顾政策、科场舞弊等做了论述。

2. 与清代乡试相关的论文

论文方面,刘海峰的《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乡试》^②论述了乡试的流变历程及其地位与影响,并对清代末科乡试概况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入挖掘。魏秀梅的《清代之乡试考官》利用清代档案、官书、私人日记、笔记、文集等史料,对于清代乡试考官的产生、规章、奖惩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其另一论文《清代科场回避制度,1645—1906》以乡会试为例,全面探讨清代科场回避制度的相关规定。李纯蛟的《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对于清代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防弊对策和防弊对策失效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此外,香港大学 Adam Yuen-Chung Lui 的论文 Syllabu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hsiang-shih) under the Early Ch'ing(1644—1795)^③对清代早期乡试内容的演变作了简明勾勒,其中对八股文的存废及其背后的动因进行了精到的论述与分析。

(二)与清代某直省乡试相关的著作及学位论文

在科举的断代区域研究方面,国内目前已有四篇学位论文问世。其一,姜传松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江西乡试研究》^④,现该论文已正式出版,成为首部清代直省乡试的著作。该著作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与横向的空间维度,或并列或交叉地对清代江西乡试进行考察,并且从制度、活动和器物等三个层面对清代江西乡试展开研究。其二,赵娜的《晚清顺天乡试研究》。^⑤它对清末顺天

①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年。

②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③ Adam Yuen-Chung Lui, Syllabus of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hsiang-shih) under the Early Ch'ing(1644—179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8, No.3, 1974, pp.391-396.

④ 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赵娜:《晚清顺天乡试研究》,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